

地方国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与策略

——对话浙江财经大学浙商资本市场研究院执行院长武鑫

□本报记者 江英华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地方国有资本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如何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备受关注。面对区域资源差异、市场化挑战等问题,地方国资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财经大学浙商资本市场研究院执行院长、地方财税治理能力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实验室执行主任、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执行副主任武鑫,探讨地方国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与策略。

记者: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地方国有资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武鑫: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国有资本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使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者和系统支撑者角色。它不同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市场资本,其核心定位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索、重大共性技术攻关以及需要长周期、高风险投入的原始创新领域。地方国资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大局,通过资本纽带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源,聚焦于那些关乎未来竞争力但市场资本因风险高、周期长而暂时不愿或无力覆盖的关键环节,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稳定器”与“助推器”。

记者:地方国资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哪些模式和路径?

武鑫:地方国资需要精准发力,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

首先,强化政策与资金保障。地方国资可在业绩考核中增设科技创新专项指标,将关键技术突破、专利转化等纳入企业负责人评价体系。在薪酬分配上,对参与重大攻关项目的团队实施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等激励机制。同时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保障长期研发投入,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稳定支撑。

其次,创新市场化运作模式。可设立或参与管理专注硬科技、前沿技术的早期投资基金,尤其是天使基金和种子基金,填补市场早期投资空白。例如,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初创科技企业。针对“卡脖子”技术,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或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形成联合攻关合力。此外,搭建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提供概念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孵化等全链条服务,通过技术经纪人团队对接供需两端,降低转化风险。

最后,聚焦产业链协同升级。围绕本地优势产业或未来重点培育领域,实施“链长制”,通过国资投资布局“链主”企业或“补链强链”项目。例如,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设备研发、材料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建共享中试平台,带动产业链整体技术升级。同时,地方国资应立足战略定位,避免与民争利,重点投向市场失灵领域,通过政策引导、资本撬动和资源整合,实现“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记者:作为“耐心资本”,地方国资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



武鑫

展时,如何构建兼顾长期培育与风险防控的投资机制?

武鑫:地方国资需从理念到机制进行系统性变革,通过“宽容错+差异化考核”实现“耐心投资”与“风险可控”的平衡。一方面,各地积极出台创投尽职免责、100%容亏等“容错”机制,打破传统考核束缚。例如建立“双红线”柔性标准:设定单个项目亏损不超过投资额30%、年度科创投资失败率不超25%的底线,对因技术路线迭代等非主观决策失误导致的失败,经专家委员会认定后予以免责。同时,明确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创新项目纳入豁免范围,切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另一方面,完善基金差异化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分层分类、长周期的考核评价。摒弃“一刀切”的考核标准,避免过度关注短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杜绝“不敢投”“不愿投”现象。对早期科技项目采用“直投+跟投”模式,联合市场化基金分担风险;对成熟期项目则通过市场化退出机制实现资本循环。此外,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科创项目进行动态评估,结合技术成熟度、市场潜力等指标优化考核权重,以此激发投资团队支持硬科技的积极性,构建适应创新发展要求的产业投融资体系。

记者:各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地方国资如何精准“因地制宜”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赛道?

武鑫:地方国资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赛道,需立足本地实际,避免盲目跟风,科学规划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应深入剖析本地独特的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人才储备,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力,推动优势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对于传统产业,要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助力其转型升级,而非简单放任或主动淘汰,更不应盲目转向发展本地缺乏条件或优势的新兴产业。

其次,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施差异化策略:在经济发达、实力雄厚的地区,可在国资创投的支持下,适度布局多个依托本地资源禀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需保持理性,杜绝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盲目投资所有新兴领域的行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实力较弱的地区,国资创投则

需集中有限资源和财力,精准聚焦一到两个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确保产业发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避免因资源分散而导致的低效投入。

最后,建立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专业化的投资决策机制至关重要。通过科学的激励机制激发投资团队活力,以严格的约束机制防范投资风险,依托专业决策流程提高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国资创投在推动地方产业发展中发挥更积极、更科学的作用,助力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强大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集群。

记者: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国资应如何构建多方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武鑫:地方国资要构建可持续的新质生产力创新生态,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深化协同机制,畅通创新链条。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构建“政府规划—国资搭台—科研赋能—企业落地”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政府发挥顶层设计作用,明确创新方向与重点领域。国资凭借资源整合优势,搭建产业对接、技术交流平台,汇聚科研院所、高校智慧,为企业输送前沿技术。同时,完善创新政策支撑保障机制,破除体制壁垒,健全科技成果确权、收益分配等配套制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建立国资基金投向科技创新的容亏机制,设定合理容亏区间,引导创投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企业,即便短期收益难达预期,也持续给予资金支持,激活创新源头活力。

二是强化产业联动,促进要素融合。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推行“链长制+创新联合体”模式,由地方国资牵头组建产业联盟。链长统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梳理技术短板、需求清单;创新联合体整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力量,协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深化“四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支撑保障机制,以项目为牵引,探索“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新模式。完善“引在高校、用在企业、联合引进、共同使用”的联合引才机制,突破人才地域、单位限制,让高端人才为产业创新所用;分层分类整合资金资源,政府引导基金、国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协同,为创新不同阶段输血;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科技成果经企业转化为产品,金融为转化全流程提供资金,产品盈利反哺科技研发,形成良性闭环。

三是创新资本运作方式。设计“耐心资本+市场化资本”的接力投资体系。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值得借鉴:通过天使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设立专项子基金,对早期项目采用“国资领投、让利跟投”策略,国资率先投入承担风险,社会资本后续跟投共享收益,降低社会资本顾虑,汇聚更多资金支持初创企业;对成熟期项目则通过市场化退出机制实现资本循环,借助上市、并购、股权转让等方式,让国资有序退出,回笼资金投入新的创新项目,形成资本“投入—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对话金融大家

数字贸易背景下浙江外贸行业就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

□张甜

摘要: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贸易成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浙江作为中国外贸强省和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其外贸行业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深度转型的过程。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系统分析其对外贸行业就业结构的深刻影响,揭示数字贸易对岗位结构、技能需求和用工形态的变革趋势,并从数字人才培养、平台制度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建议,旨在为提升浙江数字外贸就业质量和稳定性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数字贸易 浙江省 外贸行业 就业结构 优化路径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数字贸易不仅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交付方式,还深刻重塑了产业链、价值链乃至就业结构。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在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出口、智慧口岸建设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也面临着传统就业结构失衡与新兴岗位需求不匹配的双重挑战。如何借助数字贸易契机,实现外贸行业就业结构的高质量优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浙江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就业特征

数字贸易发展亮点。

近年来,浙江省依托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以“跨境电商+数字服务”为核心的数字贸易体系。杭州、宁波、义乌等城市先后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了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义乌购、菜鸟网络、网易考拉等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集群。这些平台不仅实现了“商品+服务”的数字化出海,还通过技术赋能中小企业,提高了整体贸易效率与覆盖范围。

据浙江省商务厅发布的《2023年全省外贸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浙江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6200亿元,占全省外贸总额的17.3%,同比增长22.4%。其中,出口增速尤为显著,成为稳定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柱。

就业结构变动特征。

随着数字贸易生态的不断完善,浙江省外贸行业的就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重构趋势,主要体现在岗位类型转型、技能结构分化和用工模式多元化三个方面。

首先,岗位类型由制造导向加速向服务导向转变。传统外贸以制造业岗位为主,侧重于生产加工、质检、装箱等环节。而数字贸易推动交易线上化、流程平台化,大量岗位聚焦于前端运营与后端管理,如跨境电商运营、平台客服、用户体验管理、供应链协调、物流数据分析等。阿里巴巴国际站在2023年招聘中,平台客服、数据分析员、短视频编辑等岗位同比增长超过30%,充分反映了服务型岗位在数字外贸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出“高低两极化”趋势。一

方面,数字外贸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尤其是具备数字营销、AI内容生成、跨境支付系统运维、用户行为分析等复合能力的岗位,如某大型跨境直播公司明确要求运营人员同时具备市场分析能力与数据可视化能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生态又为中低技能群体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如仓储物流、在线客服、内容初审、海外仓分拣等岗位。这种“双层拉动”结构,有效扩展了浙江就业吸纳能力,但也带来技能适配压力。

再次,就业形态日益平台化与非标准化。数字贸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技术载体,打破了传统“企业—员工”的线性雇佣结构,大量劳动者以自由职业者、合同制、项目制等形式参与就业。在速卖通、TikTok电商生态中,部分从业者以个人身份运营直播账号、处理订单、生成内容,实现跨境自由创收。这种就业方式具备灵活性高、进入门槛低的优势,但也带来了社保覆盖不足、职业晋升路径模糊等现实挑战。

数字贸易重构了浙江省外贸行业的就业生态,一方面拓展了新兴就业空间,提升了劳动市场的动态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人才结构错位、权益保障薄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变动不仅体现在数量结构的调整上,更反映出产业数字化背景下就业内涵的深刻演进。

数字贸易对浙江外贸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岗位创造与替代并存。

数字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部分传统岗位的替代风险。

一方面,平台电商、社交电商、数字直播、内容出海等新兴模式推动了直播销售、数据标签、短视频运营、跨境客服等新岗位的快速增长。以阿里国际站和TikTok电商为例,2023年仅在义乌和杭州就新增相关岗位超10万个,有效吸纳了应届毕业生及灵活就业群体。

另一方面,传统岗位如制造车间工人、外贸中介报关员、人工客服等则因数字化系统的引入(如自动化订单处理、AI客服系统、在线清关系统等)而逐步被边缘化。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预测,到2027年,中国有超过15%的贸易岗位将因自动化产生结构性调整。这种“创造与替代”并行的格局,使就业结构进入持续动态调整阶段。

技能需求结构升级。

新兴岗位要求更高数字素养和跨学科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市场分析能力、平台操作技能。同时,中小企业对复合型人才(技术+营销)需求强烈。数字贸易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高度融合的贸易形态,对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兴岗位普遍需要较强的跨学科能力,尤其对于中小外贸企业而言,一专多能型人才更具“投入产出比”,因而成为招聘重点对象。同时,对于中低技能群体而言,数字技能的基础培训成为能否融入就业生态的关键门槛。

就业模式平台化、弹性化。

与传统工业化时代“企业—员工—固定岗位”的刚性

雇佣不同,数字贸易平台带来了就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以阿里巴巴国际站、菜鸟物流、Lazada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构建了“任务型、订单型、远程型”用工体系,催生大量“网商”“自由运营人”等非标准就业形态。

上述就业模式具备较强的弹性优势,一方面降低了就业门槛,促进了女性、借债上市、返乡人员等群体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保覆盖不足、收入波动较大、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等问题,挑战了现有的劳动关系规制体系。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平台型就业形态将继续扩张,但必须辅以制度创新与技能支持,方能保障就业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就业结构优化路径建议

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应设立数字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运营等专业方向,强化校企合作与实训机制。鼓励职业院校开展中短期岗位技能培训,提升仓储、客服、内容编辑等岗位适应性。建立终身学习平台,支持个体劳动者持续提升数字能力与平台适应性。

完善数字平台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机制。

推动制定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平台+社保+个人账户”模式。明确平台用工责任界限,鼓励平台设立职业伤害基金或意外险,提升劳动者保障水平。鼓励工会、行业协会建立平台从业者权益协调机制,促进劳资关系稳定。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生态共建。

加快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外贸数字平台在县域布局,促进区域人才回流与再就业。建设数字外贸园区,集聚培训、金融、服务资源,形成产业协同效应。通过税收、金融扶持政策,鼓励本地平台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实现本地人就地就业。

强化数据治理与政策响应机制。

建立浙江省数字外贸就业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岗位变动趋势与技能需求。加强政策部门与平台企业协同,快速响应新业态下的就业挑战。推动就业统计口径改革,纳入弹性就业、自由职业者数据,提高政策覆盖度与精准性。

结语

数字贸易已成为浙江省经济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其对外贸行业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既有挑战亦有机遇。唯有顺应平台经济与技术变革趋势,通过人才、制度、区域和数据四位一体的综合优化路径,才能真正实现就业结构的协同优化与升级。未来,浙江还需进一步探索高质量、可持续、具有公平性的就业新生态,以数字化激发更多社会活力与创新动能。

(作者系工学博士、温州商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基金项目“2025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主办单位

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

科技金融时报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金雪军 吴伯正

副主任委员:

卢映瑞 谢文武

武鑫 吴蕴赟

专家编委成员:

郑长娟 禹久泓 顾光同

韦宏耀 游丽彦 符茜

郑成思 叶茜茜 叶梦琪

徐少君 肖欢明 谭华

邱波 马翔 鲁统宇

刘建丰 金玮佳 万谋

联合主办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宁波大学

宁波财经学院

温州商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嘉兴南湖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征稿负责人:夏玮蔓

0571-56025227

投稿邮箱:

E-mail:zslmym@126.com